

试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郭红娟

(洛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贸易系,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 在帝国主义加深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洋务运动兴起等复杂形势下, 郑观应形成了“商战”思想。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以“商”立国、行“励商之法”、“开议院”与“设商部”等是其“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虽然由于时代及其自身认识的局限,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但其强调大机器工业及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等观点, 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郑观应; 商战; 商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08)01-0053-03

收稿日期: 2007-08-12

作者简介: 郭红娟(1965—)女, 河南孟津人, 历史学博士, 洛阳师范学院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

1840年起,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救国道路探索。经济道路的探索, 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郑观应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实业家, 一个近代中国工商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家, 他的经济思想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呼声和社会发展趋势。因此, “商战”思想作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更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资本主义性。

一、“商战”思想的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这一过程的进行, 伴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为缓和内部矛盾, 适应新阶段发展需要, 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加紧对外侵略, 掠夺大量的殖民地, 扩大商品市场; 另一方面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 攫取各种经济政治特权, 加强对外经济控制。

在这种形势下, 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强行对中国倾销产品, 掠夺中国的原料; 同时又对中国加强资本输出, 妄图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附庸。甲午战争后, 列强又获得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 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就这样, 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遭到摧残, 城乡手工业日趋没落, 农产品开始商品化; 作为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濒于破产, 土地私有制受到了严重动摇, 封建经济基础逐渐解体, 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为了维护统治, 清政府在遭受侵略的同时, 掀起了

以“自强”为旗号的洋务运动, 先后创办一批军事和民用工业,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王朝的实力。但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企业是以政治强权为后盾的垄断行业, 其发展运作严重违背经济规律, 脱离市场经济要求。同时, 这些企业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建立的, 仅仅是维护落后体制的一种手段。因此, 洋务运动即便是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也注定其失败的命运。同时, 洋务运动排斥和压制民间企业的发展, “即如关税洋人仅完厘半, 而华人则勒索数成”^[1]。因此, 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当时步履维艰的发展环境及“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进行了较多的批判, 在探索富强道路的同时, 也在完善着自身的经济理论。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产生的。“商战”思想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精华和主要内容, 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实质是发展中国自主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初学商战于外人, 继则与外人商战”^{[2] (P74)}, 以此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驱逐外国侵略者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1. 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 在中国内地, 除了洋务派创办的几个军事及民用工业外, 其余重工业几乎全为列强垄断。这些外国企业采用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而中国的企业, 包括洋务派在内, 要发展就必须向外国购买机

器。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家抬价勒索,以次充好,使中国企业蒙受着巨大损失。因此,郑观应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派人士所提出的单纯利用外国先进的工具进行发展的主张,他认为,要真正独立自主发展,并走上富强道路,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尝阅西书,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自设制造局,……宜设专厂制造机器”^{[3] (P5)},只有这样,才具有与外国进行“商战”的资本,否则是不堪一击的。

郑观应强调重视大机器的作用,是他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对外国企业的考察得出的正确结论。他认为外国资本家通过机器生产,将中国的廉价原料,加工成工业产品,进而以高价出售给中国,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中国若不发展自己的机器工业,只能永远是受害者,纵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只能是“弃己利以资彼用”^{[4] (P11)},为帝国主义的富强充当原料供应商。因此,中国不仅要利用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应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并发展自己强大的机器大工业。郑观应的这种认识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比起洋务派和早期的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又前进了一大步。

2以“商”立国。这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精髓和核心。郑观应认为整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以“商”立国,以实际行动来保护商务,商业壮大了,才能对外进行商战。“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大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5] (P1)}。也就是说,商业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应处于主导地位,其它部门只能围绕商业来进行,只能作为商业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鼓吹的“以农立国”的谬论,为洋务运动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观应认为,“商业”应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及流通中的一切部门,而不仅仅指商业。应“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部门中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同时,还必须限制和取消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尤其是协定关税、内河航运及开矿、筑路、设厂等特权。他指出,外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外国侵略者是以掠夺中国经济资源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为目的;只有限制和剥夺其在华的特权,并给华商企业发展以宽松的环境,外国的经济侵略才可得到抑制,“商战”的目的才可实现。他对清政府出卖海关于洋人,并堂皇鼓吹“华人贪鄙,不如外人清廉”的论调,进行了有力地驳斥。他认为,如谓华人尽不如西人,那么中国 18省之督抚亦必将全用西人,那将是十分可笑的事情。对洋务派

公开提出批评。

3行“励商之法”。郑观应认为,除了限制和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华特权之外,还应在国内营造一个安定自由的行商环境。他提出,国家政权存在的目的即是为商业做庇护的,国家政权须实行“保商之法”来革除“困商之政”,立“励商之法”,包括设立专利局,保护专利权,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发展企业,裁抑厘卡,减轻商业捐税及负担等措施;单靠立法尚不够,政府更应给商业以行政上的直接支持与扶植,以使中小企业不至于被外国企业兼并而破产。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郑观应曾对洋务派官僚寄予很大期望,认为在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上层统治者来发展近代工业,既有政府的后盾,又有雄厚的财政支持,只要经营得方,“商战”的目标很快便可实现,这也是他投身洋务运动、创办洋务企业的出发点。他极力推崇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政策,认为这是发展近代工业的惟一可行道路,而且是最佳道路,是最合理的企业形式,“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官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6] (P3)}。在实际过程中,他带头招过不少商股,曾致书李鸿章请求“给予十年内限制同类企业开设的特权”,这是他早期的主张及实践。但到洋务运动后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折。面对名曰“官督商办”实为“官夺商权”的洋务运动,他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强烈指责洋务派官僚“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中饱私囊的弊端,对洋务派压迫下的私人资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为此,他提出“全以商股之道悉刮内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7] (P3)},并以此为原则,呼吁在全国推行“励商之法”,指出洋务派不过是清政府掠夺财富的一种工具而已,“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士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从驱爵成怨府”^{[8] (P370)},只有通过实施“励商之法”,才能真正给国家商业的繁荣昌盛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保障。

4“开议院”与“设商部”。这是郑观应“商战”思想中的闪光点,初步带有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要求。他认为单靠清政府的空口承诺和一纸立法,并不足以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条件。为此,他提出了“开议院”与“设商部”的要求,主张要把商业作为一个特殊部门与其他部门区别对待。同时,在政治上应使资产阶级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保障商业在现实中得以顺利发展,从而避免因众多剥削和捐税而停滞。

郑观应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性,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反映出郑观应开始对封建政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了初步认识,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落后的封建制度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却没能

将它深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只是停留在改良的思维阶段;而且,他的“开议院”与“设商部”的政治要求,只不过是商业发展服务的,并非政治目标,还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在实际施行过程中,也没有一种坚定的决心。他主张的“开议院”,实际上只是一种商业发展的咨询性机构。“设商部”也只是为资产阶级发展商业提供一些优待权。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又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也与郑观应自身的认识水平有关。

三、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评价

商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商业的兴盛与否,是评价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依据。在“以农为本”的传统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都坚决地执行着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因商业萎缩而积聚的贫弱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暴露无遗。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停滞的社会形势下,郑观应形成了他的“商战思想”。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出“以商为本”思想的第一人,他的“商战”思想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观应把列强日益严重的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并由此提出了“兵战”和“商战”思想,而他更为注重“商战”的地位。他说外国侵略者“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1]9(19)},“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1]4(11)}。郑观应认为,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应进行“商战”,从经济上摆脱国外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而发展军事,实现强兵的目的,即先富国后强兵。这样,郑观应将其“商战”思想用于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联系了起来,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代表了众多爱国人士及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心声,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在围绕商业发展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方法、措施,为当时及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其“商战”思想中提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腐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优先发展大机器工业,并对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洋务运动进行了较深刻的批评指责。就在那个时代,给人一种振奋的精神力量,影响了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

但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还只是一种幼稚的、不成熟的、近乎空想的理论,在当时不可能得到贯彻。第一,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认识不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抗。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否定因素,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势必瓦解封建统治,因此清政府不可能真正去支持其发展壮大;第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孕育出来的必然是一种既有反抗

更有妥协的畸形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坚决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这却是他们无法办到的;第三,对政治与经济的相互性缺乏认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种社会规律。郑观应仅仅认识到了经济决定政治,却忽视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期望清政府从政治上鼓励发展资本主义,无异于要其自挖墙脚,根本无法实现;第四,思想的进步性与目的的落后性的矛盾。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最终是为实现清政府国富兵强而服务的,这就与其思想的进步性产生了矛盾。一旦实施,在其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和弊端,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第五,忽视了军事的重要性。郑观应没有意识到,国家安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一旦国家动乱,发展经济也只能是空谈,因而,他重“商战”而次“兵战”的观点也是有所偏颇的。

综上所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虽是一种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思想,但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他强调大机器工业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机器大工业,这已初步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行“励商之法”与设商部等,在当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他所强调的商业的重要性,也依然在当今世界各国被普遍地运用着。尽管他的商业观点不可全取,但却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A].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C].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 [2]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A].盛世危言(后编)(卷八)[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3] 郑观应.商务五[A].盛世危言(三编)(卷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
- [4] 郑观应.商战[A].盛世危言(初编)(卷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5] 郑观应.商战[A].盛世危言(初编)(卷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6] 郑观应.开矿[A].盛世危言(初编)(卷五)[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7] 郑观应.商务二[A].盛世危言(三编)(卷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8]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A](卷二).夏东元.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9] 郑观应.商务[A].盛世危言(初编)(卷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尚东涛]